

一种关注

《扫黑风暴》中的那些法律知识流

徐晓枫 陈翔宇

电视剧《扫黑风暴》作为一部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剧作,已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剧中情节大多取材自真实案例,真实、敢拍因此成了这部剧的标签。此外,本剧不仅情节引人入胜,还通过法治的视角深度阐明了黑社会的危害性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必要性,因此对该剧折射出的法律知识的解读就显得更为重要。

记者黄希为收集新闻素材,假扮成顾客前往一家医美中心,工作人员在没有询问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立即向她推荐了“美丽贷”。根据剧中给出的信息,这款产品不仅利息奇高(三个月内18%,三个月以外25%),借贷者还面临被暴力催讨、提前还债的风险。所谓“美丽贷”是指金融机构与医美机构合作,向医美消费者发放的专门用于医美用途的贷款。不过,医美行业本身规范性较弱,“美丽贷”乱象丛生,俨然成为了“骗贷”与“诱贷”的高发地,在黑猫投诉平台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投诉都与医美项目有关,而且医美机构存在与金融机构合谋的乱象,以欺诈形式诱骗消费者贷款整形,而后双方就贷款金额进行分成,因此必须严格规范“美丽贷”。今年6月9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规范医疗美容相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倡议。倡议提出,金融机构不与任何不法医疗美容机构开展合作,不向任何不法医疗美容机构客户提供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

徐英子则是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她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却为解救勒索未遂被关进看守所的弟弟,用“裸贷”的方式,凑齐了5万元赔偿金找当事人和解,因此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直至从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裸贷”是指借款人通过裸体手持身份证的照片或视频做“担保”向贷款方贷款,以此从贷款方获得金额不等的贷款,当发生违约不还时,贷款人以公开裸体照片和与借款人父母联系的手段作为要挟逼迫借款人还款。裸贷合同虽然以自愿为原则,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且借款人多数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其法律效力却值得深究。根据《民法典》第8条和第153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所谓公序,是指公共秩序,即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而良俗,是指善良风俗,即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女大学生“裸贷”虽然是个人自愿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形成了不正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显然违背我国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裸贷合同无效。如果贷方以公开裸照相胁迫攫取暴利,更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新帅集团的海哥可谓是剧中的喜剧担当,成为了观众情绪的重要调剂。他作为新帅公司的大股东,为了从孙红雷饰演的李成阳手里拿走股份,便玩了一出“恐吓计”:通过碾压手下的假腿,恐吓李成阳,硬生生逼迫李成阳签字,骗走了李成阳手中的股份。根据《民法典》第150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很明显,海哥作为胁迫者,故意实施了非法胁迫行为,即使他碾压的是假肢,并不会给手下手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却会使李成阳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这份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李成阳可以行使法律赋予的撤销权,一旦这份合同被撤销,便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菜市场“菜霸”杨冬的行径,令人瞠目。杨冬直接控制了绿藤市所有蔬菜的数量和市场,他甚至扬言: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冬的许可,这是规矩。因为背后有着多重保护伞,导致菜农对其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忍受。而建安民爆公司的老板陈建波也让观众恨得牙痒,他号称“绿藤炮王”,因为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使得公司的同行都挤出了绿藤市,即所有公司爆破许可证早已过期,陈建波仍然可以高价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菜霸”杨冬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在向菜农提供蔬菜时强制限定其销售价格,而且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蔬菜,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而“绿藤炮王”陈建波很难凭一己之力将所有同行挤出绿藤市,而他又一直与绿藤市政府联系紧密,根据《反垄断法》第33条,绿藤市相关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之嫌。

与新帅集团签订伊河新村转让合同的绿藤中梦投资有限公司,名义上的大股东是文良,背后的隐名股东则是更方便出场的石门区区长董耀。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而出于其他

原因,以他人名义出资,且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均记载为他人的实际出资人。我国公司法并不禁止隐名持股,但是根据《公务员法》第53条,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而董耀作为石门区区长,其行为明显违反了该条规定,而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务员法》旨在防止公务员进行权钱交易,保证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公务员法》之所以明令禁止公务员参与生产经营活动,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而派出所所长胡笑伟,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包庇反派孙兴,不仅对孙兴的犯罪事实视而不见,甚至还擅自删除了孙兴作案的证据。此外,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主动向徐英子索要并收受财物,逼得徐英子走上了裸贷的不归路,触犯了毁灭证据罪、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徇私枉法罪等多个罪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因此提高新时代公务员队伍治理能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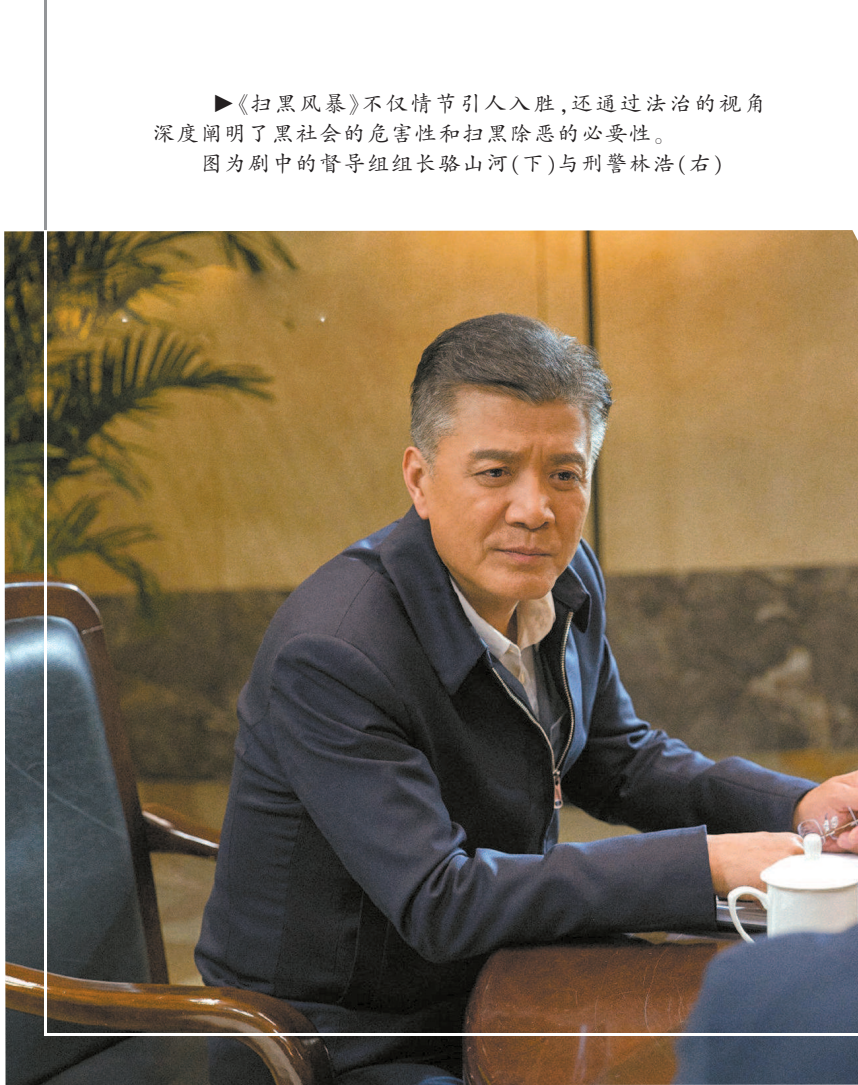
2018年3月《监察法》颁布施行,它规定了六类监察对象,在法律层面上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三年来,《监察法》通过公职人员秉公用权、依法履职、廉洁从政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威力初显。今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监察官法》,这是继《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之后,我国又一部关于深化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法律,进一步为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

《扫黑风暴》顾名思义,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少剧情更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前述提到的美丽贷、裸贷、“菜霸”其实远不止涉及民事、行政领域的问,更有可能和黑社会犯罪挂钩。例如“套路贷”中的“套路”往往存在诱骗性,因此可能符合诈骗、敲诈勒索、抢劫、强迫交易等犯罪的客观行为特征,因此“套路贷”已逐步发展成为黑恶势力较常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的犯罪之一。而菜霸杨冬的案件也来源于海南黄鸿发案,黄鸿发通过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对昌江地区的娱乐场所、农贸市场等多个商业领域,形成非法控制,在一座县城当了30多年小霸王,2019年作恶多端的黄鸿发被海南警方盯上,海南警方成立抓捕专案组对这个黑势力团伙进行深度打击并一网打尽。

在剧中,绿藤市黑恶势力之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他们身后有势力强大的保护伞,下至公安局局长,上至常委副市长,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本应运用手里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却选择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如何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也成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大难点。扫黑不打“伞”,犹如斩草不除根,因此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要求各地坚决落实“两个一律”要求,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问题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扫黑必反腐成为了硬性标准。

立法于上,则俗成于下。法律规定是由立法者制定和推行的,但是如果想要变成一种约定俗成,于社会生活中普及,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规定,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贪污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党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做出了良好示范。不过,从上述做起和从我做起并不冲突,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守,仍不能实现法治。目前,全民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虽然明显增强,但是促进全民守法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社会诚信机制还不够完善,例如许多大学生由于错误的消费观念深陷裸贷陷阱,小额贷款公司失信问题严重,黑社会犯罪在部分地区仍然猖獗,因此,如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法立于上俗成于下的有机统一也应成为未来努力的方向。

(作者分别为华东政法大学特聘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营商环境法制保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综艺新观察

与曾经大获成功的《向往的生活》相比,如今的慢综艺正滑向创作初衷的对立面——

是什么让慢综艺不再“疗愈”

卜天歌

慢综艺节目在几年前曾大获成功。以《向往的生活》系列为例,这档主张返璞归真、归隐田园的节目像一股清流,另辟蹊径地在彼时由《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等快综艺称霸的电视荧屏上迅速打开了新的收视局面。《向往的生活》恰如其名地为观众打造“向往的生活”,所居之地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常,需要做的不过是夏天掰玉米换取食物,冬天磨玉米换取生活费购买食材的简单任务。平凡的生活却也不失光亮的色彩。新朋友来自远方,或是叙旧或是畅想未来,始终散发着令人能够明确感知到的情真意切。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慢综艺似乎开始变味了。《向往的生活》第五季虽保持原班人马作为创作团队,在游戏环节的设置有别于前几季,每期邀请到蘑菇屋的嘉宾也竭力参与、卖力出演,个个自带“节目效果”——但不知怎地,要么被网友诟病“聒噪”,要么催人昏昏欲睡。无独有偶,标榜理念创新的“社会实验真人秀”《五十公里桃花坞》,播出后因“尴尬”被数次拱上热搜,所谓的“理想社区”理念还没有被打透出来,一个个尴尬又刻意的“名场面”已接踵而至。节目组却似乎因此尝到了甜头,干脆进一步捕捉、放大某些社交细节,并搭配上“炒话题”某一剂万能佐料,让这些所谓的慢综艺从“小火慢炖”逐渐转为节目内容与社交网络联合下的“大火猛炒”。烹饪方式一变,要保持原味也很难了。

与曾经成功的节目做对比就不难发现,近期的慢综艺正在滑向其创作初衷的对立面。这也是“变难看”的原因所在。

当“慢”成为一种假象

所谓“慢综艺”之“慢”,绝不仅指节目在节奏把控、进程速度上的“慢”,更强调的是一种理念,是从容不迫的生存状态与悠然的生活态度。这也决定了慢综艺本不该设定固定环节,应由嘉宾随心所欲、随感而发的情节走向。

“慢”的本质应是为快节奏、高压生存状态下的人们提供情感疗愈的作用,让观众与节目中的嘉宾一同专注于某件看似庸常的日常琐事时获得短暂的精神休憩空间。例如海外一档经典慢综艺《三时三餐》常常只交代一些简单的情境,将镜头拉近至一档生活的细末之处——如何处理一条刚捕捉到的小鱼、如何仔细品尝一档经典慢综艺《三时三餐》常常只交代一些简单的情境,将镜头拉近至一档生活的细末之处——如何处理一条刚捕捉到的小鱼、如何仔细品尝一档理想的价值观念,即在这样“慢”的状态烘托下,“一餐食,一瓢饮”的生活也会变得有滋有味。

近期的慢综艺虽仍怀抱着“慢”之意,却仅将“慢”作为一个固定存在的标签,实际却“慢”不下去了,而是刻意显示出急迫。《向往的生活》第五季将原本种瓜种豆、自给自足的食材获取方式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折磨”嘉宾的戏剧性操作。新拓展的“五斗米仓库”游戏环节让嘉宾们不得不在半夜两点半起床,勉强着自己去仓库获得免费食材。而后他们甚至还需要与众多当地的村民通过赛跑的方式去抢夺物资,场面混乱又令人费解。李诞、陈赫等嘉宾的典型懒汉形象在此被进一步渲染与夸张,他们一边叫苦不迭,一边背树苗、种树,成为该节目激发喜剧效果的主要依托。然而,早已熟悉的“套路”的观众对此已不再感冒,甚至产生了一种厌烦心理。另一方面,节目又将田园风光、袅袅炊烟与这一系列环节进行交叉剪辑,仿佛在强调这档节目田园牧歌式的调性仍在被坚守着,并借此营造一种似“慢”非“慢”的假象。这种表现既没有纯竞技类综艺爽快,又缺失了“慢”作为一种态度与理念上的纯粹,由此显得夹生。

当“真情”成为一种“虚情”

并不难理解,慢综艺“慢”不下来的原因有很多。毕竟像《向往的生活》等节目已经进行到多季,如若在环节设置上总是一成不变也很容易会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可变动太多,难免又



《扫黑风暴》不仅情节引人入胜,还通过法治的视角深度阐明了黑社会的危害性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必要性。图为剧中的督导组组长骆山河(下)与刑警林浩(右)

把握失衡。但事实上,环节的设置也好,节奏的把握也罢,始终是慢综艺的“皮相”,而非内核。慢综艺真正的内核应是对情感的传递与表达。这种表达不限形式,也不拘于某个个体,却往往因朴素、真挚而动人。

《向往的生活》第一季开篇中,嘉宾宋丹丹无论是谈到曾用名“宋长英”,还是带领大家唱旧时的歌曲《心火》,都是无心插柳的灵感显现,就像是真的前来拜访老友所乘兴挑起的怀旧话头。这些独特的文化符号激发了与宋丹丹同龄观众的怀旧共鸣,也为年轻观众提供了一个探寻父辈过往的想象性空间。因而,“宋长英”“心火”等独特的符号成为了《向往的生活》饶有趣味的经典“梗”。这一系列无预设的“真情”环节让这期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获得了网友“开篇即巅峰”的高度评价。在第四季中,节目组曾请老狼、郑钧等黄磊的老友前来做客。没有游戏环节,也没有刻意的话题植入,仅仅是老友之间默契地相伴、闲适地交谈、真挚地相拥,便营造出了十分动人且温馨的整体氛围,这正是真情所具有的独特力量。哪怕是《中餐厅》这样的经营类慢综艺,打动人心的也并不是何等高明之经营之道,而是嘉宾真心想要做好工作,但总是事与愿违而随之产生的无力感与急切感。这种情感带有几分窘迫,却又颇为真实。

但是,当“真情”被“虚情”所替代,这种打动人心的能量也随之消失了。时下的一些慢综艺便遍布着刻意营造的“虚情”——剧中的嘉宾们被硬弩着建立一种看似在不断增强的情感纽带,可他们彼此之间不动声色的隔膜乃至不屑早已成为旁观者的观众所洞若观火。于是,一些真人秀像是给自己披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只要自己不承认,观众便也感知不到那份假意。而观众还坚持寻求的动力,无非是以娱乐八卦的心态寻求这份虚情偶尔暴露的痕迹。

在这里,如今的慢综艺还显示出一种创作的误区,即认为“情感”仅存在于嘉宾个体本身,因而必须让他们通过种种形式将个体情感表现出来,并借由综艺效果将其无限放大。于是,我们常常看到嘉宾们在综艺节目中一回哭、两回笑;一边委屈落泪、一边道

歉解释。如此表现的本质是对“情感”的程式化加工与包装,并将其镶嵌在节目的固定程式之中。事实上,慢综艺所强调的情感传达不应仅仅指向节目中嘉宾们的个体情感,更应该指向广大受众所能普遍感知的情感。让节目与观众之间形成内与外的情感连结,注重观众的真实体验,如此才能促发节目与观众产生更广泛的共鸣,以人情温暖人心,从而起到疗愈的作用。

当消费主义成为美好生活的幻象

广告在综艺节目中的植入并非罕事。例如《奇葩说》等语言类节目堂而皇之地让赞助商的广告“硬着陆”,通过主持人直接播报广告词的方式反复宣传,力图起到“洗脑”的效果。可对于强调情感体验,风格内敛的慢综艺而言,一直以来广告的植入方式都是偏向于“软着陆”的。《向往的生活》从第一季便开始饲养的奶牛被嘉宾们起名为“苏苏”正是对广告主品牌名称的化用。这种独特的植入方式起码还展现出创作者应有的一份节制。而至近期,第五季的《向往的生活》不仅每隔十分钟便进行一次广告广播,甚至直接增加了赞助商福利环节,让嘉宾们通过各种花样的游戏模式宣传产品。有网友对此讥讽道:“建议改名为向往的金主爸爸。”慢综艺原本悠然而然的格调是否已被破坏,情感抚慰的作用是否还能奏效,在此已经无需赘言。

然而,广告植入仅是消费主义的一种表层显现。从更深层面上看,种种消费主义文化符号正在潜移默化中被置换为“美好生活”的代名词。正如研究者张静等人曾指出的,当前的综艺节目显露出较为鲜明的中产文化与趣味取向,并借用符号想象建构出来种种典型的景观。的确,浪漫的全球旅行、探访咖啡厅和花店、搞行为艺术实验、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宠物相伴……这些符号景观使慢综艺虽身着朴素外衣,却在编织着美丽的消费主义幻梦。

可是仔细想来,慢综艺的创作初衷难道不就是为深消消费主义文化中的都市人找寻一处提供隐藏的栖身之所吗?如不能,慢综艺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这还有待创作者们作出解答。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